

天生是个女人

陆星儿



馆

I 247.7
504

天生是个女人

陆星儿·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天生是个女人

陆星儿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82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

ISBN 7-5378-0320-X

I·306 定价: 4.20元

她到底要什么（代序）

王安忆

也许，所有的人生就是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要什么。不同在于，有人不自觉，而另有人自觉。在自觉的人中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就是自觉者各以不同的位置与身份在考虑：我到底要什么。而其位置与身份将决定其考虑的深度和广度。陆星儿的位置是：作为一个女人，我到底要什么。这是我从她的小说中所窥察到的。

在她那些众多的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中，我们可见到女主角往往面临着两种选择。如《风暴，又是风暴》，安妮面临着邓岩与朱捷飞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理想的选择，邓岩代表了激动人心的冒险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修养；朱捷飞代表的则是务实而利己的庸俗人生。作者并不抑制她的态度，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善与恶，美与丑，好比我们幼年时所读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儿童诗：《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陆星儿在她天真地编织美好的邓岩的时候，就已决定安妮将得不到他了，这又流露出一种苍老的心情。如《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记者陈小依，她或者乖乖做一个“新闻发布机器”和道德的榜样，或者做一个健康自由的自然人。而陆星儿实际也没有给予她多少选择的机会和决心，因此，觉醒之后的

陈小依除了痛苦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再如《一根杏黄色的水晶镇尺》中的母亲，就更无回头路可走了。一切都已发生过了，她除了叹息而外，做什么都晚了。这是为了儿女的母亲的一生，到了儿女独立的那一日，母亲才明白儿女是儿女，她是她，其间所谓骨肉血的相联其实只是诗话的想象而已，这一生便有了些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味道。到此，我们可看出，陆星儿一方面在对过去和现在，总之是既定的女人的行为方式进行痛心的检讨，另一方面则在寻找更美好更合理的行为方式。至于什么是美好与合理的，陆星儿没有提供给我们参考，或者说她自己还不很清楚，甚至相当含糊。在《风暴，又是风暴》里，邓岩所象征的那一份浪漫与求实相结合的人生理想，在陆星儿这样的年纪中，不可不说是过于稚气，因而显得极不可靠。而《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里陈小依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也被很布尔乔亚地以“公园、小桥”虚拟掉了。《一根杏黄色的水晶镇尺》中的美好生活则需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切实的是已经渡过以达今日的几十年现实生活。对既定生活的写实能力在这篇小说中要超出了以往，几乎每个细节都可经住推敲，十分靠得住，就象在眼前历历经过，于是那一个假设便更虚无飘渺了。这样，我们就发现陆星儿虽然已经知道了不要什么，却还不知道要什么。这一个问题困扰着她，她总是在想：她们应当要什么。这个念头在她心中一日比一日明晰，然后，她就决定写一组题名为“天生是个女人”的系列小说。这也是我从她的小说中揣摩出来的。

现在，陆星儿考虑“我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角色意识。在此之前，她并不单纯是以一个女人

的位置与身份去想这个问题。她曾经以知识青年，作者，记者等等的社会位置与身份考虑这一个带有人的本体意味的悬念，虽然也伴随了女人的因素。然而象如今这样，以性别为主要的因素，还是第一次。如《挂在墙上的背带裙》里的“她”，她在紧张的人生奋斗中因偶然事故得到了一段余暇，使她回悟到她所错过的做一个女人的快乐与享受：和丈夫全心全意忘记一切地做爱，做一个有吸引力的美丽姣好的女人，再做一个母亲。她对她所负荷的社会性身份感到了疲劳，渴望角色更新，做一个纯粹的女人；再如《今天没有太阳》，通过一个人工流产手术间的情景描绘，很实际地指出了在爱情与性上，女人比男人所付出的更为痛苦的代价。决定这一代价付出的不是任何社会性的原因，而却是自然的生理原因，这是有如真理一般难以违背的天意。到了这时，陆星儿已将“我到底要什么”这个问题中的某一个特定环境的性质与某一个特定时间的性质的困难都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与较为漫长的时代中可能发生的困难，这是更接近于人的本体性质的困难，也就是较为人类性的困难，便是女人的困难。应当说陆星儿是进了一步。

倘若说，象前面的安妮，可通过解约和邓岩离婚来得到重新生活的可能；而陈小依也可使自己性格坚决而摆脱她的两难境地；这一个母亲虽已无从后悔，可是假如她能够后悔，重新经历一番，也可是另一种人生，当然，那将是另一篇小说，（至少在这篇小说中，陆星儿没有完全说服我们，这一个母亲是必得这样做一世人生）。总之，以上的困难全可因社会与人类的进步而日益改善和解决，也至少是陆星儿并没有设制更具实质性的解决障碍。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下，《挂在

墙上的背带裙》中的她，是否有可能缓解她的矛盾。她是在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她的社会职责之后，才认识到她身上潜伏着的自然人性，其自然人性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如爱漂亮，希望被人欣赏，要与丈夫亲热做爱，要做母亲。这时候，觉醒是已经晚了，可是在事情还不晚的时候，当身体内自然而然生出爱美的心情，吸引异性的渴求，为人妻母的愿望的时候，作为一个身在社会中的人，却面临了那么多尚待完成的责任：谋生，职业，社会的承认，群体中的适当位置……这么多的职责压迫在她身上，将自然的请求全抑制了。这种抑制是共同面对男人与女人的，可是对于女人来说，结果似更残酷一些。因为至少在目前为止的意识中，男人比女人更适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责，而女人比男人更趋向于对自然性的服从。而社会越是朝向文明发展，却越违背于自然。社会性越强，人的职责也越重，越来越没有缓解的希望。而时代又不会倒退，人类从蛮荒中走出的时候，就失去了回头的可能。这是强者和弱者都无法逃避的困境，强者的困境只会比弱者更深重，而更加难以自拔。《今天没有太阳》，在一个人流手术室门前，聚集了一群女人，有未婚先孕者，有超生育计划的不慎怀孕者，有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场机会却怀孕了的女演员，还有象女主角丹叶这样与有妇之夫发生恋情的非法同居者……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女人与男人的接触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接触之后女人要怀孕也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怀孕之后的事情就复杂了，就再不能天经地义，自然而然地生育了，有人要艰苦奋斗，完成事业；有的因为国家人口膨胀的可怕前景必遵守生育计划原则；有的因为不符合法律程序，还有的因为违反道德……等等的原因，使得不

是每一个生命都有诞生的权利，生命诞生的神圣的天意的权利被人类生存的严酷现实取消了。而在人流手术间门前，这些悲壮的诗意又烟消云灭。即使是象丹叶这样，可以将爱情刻划得非常优雅的女人，到了这一刻，也只得接受现实，这现实就是人如动物般的卑下丑陋与无可奈何的一面，这对浪漫蒂克的爱情是一个挑战。女人无论在落后的社会或是进步的社会都会有爱情和孕育的问题，而越是进步的社会就越阻止人们顺乎其然地表现自然性要求。文明的社会也是一个人人为的社会。这样，陆星儿所发现的，不仅仅是人的遭际所给人带来的不幸，而是人的存在本身给人带来的不幸。陆星儿发现了人与社会的本质的对峙，在这互难相让的对峙中，女人又往往处于失败与妥协的地位。陆星儿虽然满腔热望，却又是清醒的，甚至有些悲观，她似乎隐隐察觉到了她要的是什么，却及早地明白，想要的都难以得到。于是她想到：干脆换一种活法试试看，就是说，脱胎换骨做一个新人，活活看。要知道，在八十年代中末期的中国北京，是非常流行这一句口号的，而那时候，陆星儿正住在北京。“换一种活法”的思想使她激动了起来，她写作了“天生是个女人”系列中的第五篇小说：《一个和一个》。

我想，当“换一种活法”的念头冲动着她的心，她如她所习惯的那样，日以继夜地写着这一篇小说的时候，陆星儿并没有想到，她写作生涯里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诞生了。《一个和一个》里写了两个女人，宋惠珊和华菁。宋惠珊是一个寡妇，由于她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丈夫，所以在失去丈夫的日子里，她也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以及全部的人生内容；华菁则是一个独身的女人，她受过完美的教育，在工作中甚至是一

个不可缺少的骨干，且具备女性的魅力和高度自觉性，修养较高，有自己的准则，不为世俗偏见所左右，总之，是一个既已在社会上成功地立足，又保护了自然的完美性的女人。在两个女人的交往相处之中，宋惠珊不断受到华菁的影响，使她觉悟到丈夫并不是她人生的全部，她应当还有自己的生活。可是，她却无意中在墓地发现华菁与有妻室子女的尹工程师的绵长的恋情，她终于明白华菁所以独身是由于她将爱情已交付给了一个男人。看到此处，我的心情是：两个女人，一个为了死去的男人活着，另一个为了活着的男人活着，其间是否存在什么本质的区别？就如生者与死者之间已无法有平等意义上的爱情，因为生者的一方还在付出，而死者已无法付出了，华菁与尹工程师之间的爱情也早已丧失了平等，因为华菁付出了她整个青春与生活，而尹工程师却一点也不曾牺牲。这两份不平等的爱情本质上是那样接近，而华菁的洒脱，自在，自我完善，弄到头来，其实只是为了向男人奉献一个更完美的“我”，其奉献的目的是一致的，其丧失自我的结局也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比宋惠珊更可悲哀的女人，她自以为自己解放了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岂不知不过是向男人提供了一个“新女性”罢了。看来，无论换多少种活法，结果都是在一个固定的樊篱之中。那么女人终究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终究是什么才是女人自己？陆星儿到了这里才真正地碰了壁，走到了绝境。在以往的陆星儿的小说中，很少有过绝望的境地，每一种困难都可找到解决的办法，今天没有，明天、后天就有了。而在此，她终于接触到了一种难以解决的困难。这种困难的难以解决是在于：造成它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它的结果也就是原因。其原因和结果可

以互相转换，如在某一面加力，就只会将困境向深处推进。比如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写香港沦陷促成一对苟且偷安的市民男女的婚姻。文末她说，是其爱恋倾城，还是倾城造成了他们的婚局？有时候，谁是因，谁是果，是难以说清的。在《一个和一个》这里，华菁越是完善自己，使自己独立，其结果就越是完全彻底的奉献，使这奉献升级，提高了质量；而也正因为有一个男人在等待着接受她，她才能平静地，安详地，内心充实地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人生不至象宋惠珊那样的虚空、无聊与前途茫茫。于是，受到华菁思想启蒙的宋惠珊在发现她与尹工程师的恋情时，她象受了骗一样，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着：“原来……原来……”地上了车，然后，有一段描写——“跳上车，车便按着一个循环的路线运行，起点便是终点，终点又便是起点。”她心里甚至生出了换房的念头。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就好象失去了一个同路人，她无法了解，其实她与她全是在一个樊篱中活动，只不过华菁的姿态优美一些罢了。这个樊篱就是男人。接下来的问题是，她们能不能冲出这个樊篱，或者说，这个樊篱是不是她们想冲出就可冲出得的。象华菁这样的女人都作了努力，却依然冲不出；而陆星儿下决心换一种活法，归根到底还是没有换成，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升起在我们面前：究竟，女人是什么，男人又是什么。这是一个人类的命题，也是一个人性的困境。陆星儿走过了许多路，终于到了这一个困境，我希望她不要因为害怕困难，而回头，或者绕道而行。

《一个和一个》是陆星儿至今为止最成熟的一篇小说，且不说小说写作上的种种娴熟自然的手法，最重要的是，陆

星儿在此终于接近了人性的困境，这困境是在人性深处，可说是核心的地位。陆星儿作为一个女人的发问：我到底要什么？可说已到山重水复的尽头。她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女人终究要什么。她想象不出一个幸福得意的女人，她的女人总是处在很多层的重负之下，而到了宋惠珊和华菁，她才将她的女人放在了女人自己的重负之下，于是，问题就变得无从解决了。陆星儿终于想到了作为一个女人的自身的问题。她不再陷落在女人的自我意识中，眼光向外注视着外界的对待，而是从自我意识中站立起来，以向内的眼光自审了。于是，这一个“我到底要什么”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从作为女人的陆星儿的脑海里升起，而是超出了性别的界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响亮地发问。

性别中有许多奥秘，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我们常常难以认清自己，只有当我们超然于自己的性别之上，方可看清其中奥秘。而一个人的性别是那样融于我们的血液，建筑起我们的肉体，推动我们的头脑，我们基于我们的性别活动与判断，如要超然，就好比是重建一个自我。重建一个自我的工程是那样浩大与艰难，自然助不了我们一点，只有凭我们自身理性的力量。偏偏女人又缺乏理性，汹涌澎湃的感情在理性脆弱的堤坝里奔流。但是，做一个作家，已是陆星儿别无选择的命运，她已幸运或不幸地迈出了脚步，尽管前途茫茫，却无法再回头了。

一稿于1989年1月11日

二稿于1989年1月17日

目 录

她到底要什么(代序)..... 王安忆

- 女律师的故事.....1
- 挂在墙上的背带裙...53
- 今天没有太阳.....73
- 再寄一朵冰凌花.....88
- 一个和一个.....122
- 迷 失.....138
- 不洁的女人.....194
- 一根杏黄色的水
 晶镇尺.....222
- 关于一个女记者
 的“新闻”.....276
- 风暴, 又是风暴.....322
- 三十五岁的女人.....355
- 有人来等车了,
 雨还在下.....375

采访手记

- 这也是一种生活……392
- 不由自主……396
- 重要的是发现自己……400
- 她这样选择了自己……404
- 两种活法……408

女律师的故事

一 她的生活

我不怕说，我是个独身女人。1970年离婚，十六年了。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法律上他们不属于我，但他们是我的，我生的。

她在法院工作过二十年，当书记员，1980年开始当律师。那时，律师制度刚刚恢复，这项事业还很年轻，她却已年过四十。对一个上了四十的中年女人来说，人生最美妙的一幕演过了，该结果的在结果，该结束的也快结束，所有的非分之意和跃跃欲试的冲动，都知趣地引退，生活趋于安稳实在。身子圆了，步伐慢了，声调沉了，频率低了，节奏缓了，因为青春没有了。

我固执，不肯承认常规。我总觉得，过了四十，自己才愈发年轻。“四人帮”粉碎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摘掉了，组织上信任了，又派去北京中央政治干校学习，我很兴奋。总算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想，这才是生活的开端。

伍玉辉——她名字里包含了父母明确的心愿——父母是曾经“高贵”、“辉煌”过的。父亲当年是×××部下的团

长，在家乡有过不小的名望。母亲出身大家闺秀，在偏远的市镇上，称得上是个富贵的官太太。但事于愿违，“伍小姐”运气似乎并不佳，好象天生与金辉玉贵等无缘。她坎坷大半生，尽遇到难解的麻烦。所以，她给自己取个小名——伍子。所谓“子”，有最博大的意思，人的通称；又有幼小的、嫩的、或最小的颗粒之意。总之，是小的，不起眼的，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是自嘲吗？回想起来，她从小向往着做了不起的事情，过了不起的生活。1949年，她才十一岁，看到街上到处张贴着解放军征兵启示，她偷偷跑去报名，偷偷跟着部队走了。“伍小姐”的失踪，使家里家外惊慌好一阵，母亲急病了。她却在一年之后才给家里写信，不久，就去了朝鲜，1956年才回国。

那段生活太好了。我记得，那时的我留两根长长的大辫，穿两排扣的黄军装，腰里神气地束根宽皮带，就象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芳。见着首长，他们都叫我“小家伙”。确实小，刚到朝鲜，只有十三岁，夜里尿憋醒了都不敢起床，只好悄悄尿在皮靴里，早上偷偷倒了，擦擦干又穿在脚上。整整五年，我们跟着部队在战壕里、在前沿阵地、在行军路上、在临时宿营的山间林中唱呀跳啊，伴着枪声、炮声和硝烟。生活充满激情。

但生活不都是激情的，也有懊丧的时候。

抗美援朝结束，大部队陆续凯旋而归，文工团又继续留守一段时间。那年，她十七岁，“小家伙”长大了，出脱得十分俏丽，腰身苗条挺秀，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神采十足。她生性快活好动，舞姿轻盈得象飞，歌声婉转动听，在文工团里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小姑娘，那些随军记者的相机常

常对准她，掇留下不少欢快的笑容。但有一天，政委找她谈话。她哭了，哭得很委屈。小伍多大了？十七。该成家了吧？政委，别开玩笑。不是玩笑，这是任务。政委和蔼又严肃。她怔住了。任务？！在前线，在后方，几乎天天都在执行任务，这是军人的天职。战争结束了，她没有想到，还得接受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你认识五团的平副团长吗？她认识。一个小个子，象四川人。他见过你，印象很好。明天，你去五团玩玩，有吉普车送你，平副团长就在团部。政委安排得周到。为什么要去？去和那个小个子团长成家？她不想去。我不去。她当然明白“成家”是怎么回事，文工团里有些比她年龄大的女团员成家了，每到星期六准许回家。星期一回团，她们有的眼睛哭肿了，有的大腿上红一块、青一块的。她不好意思问，只觉得她们过了一个并不愉快的星期天。她庆幸自己比她们都小，没有“成家”的任务。现在，终于轮到她了……政委耐心说服，这是党和部队领导对一些老同志的关怀，他们为革命打仗，不怕流血牺牲，从不考虑自己，所以，组织上就要多为他们考虑。他们都是些好同志，好干部，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也有利于你更好地改造思想，更好地成长进步。这也是党对你的一种信任。你背叛了家，参加革命队伍，表现一直很好嘛！她没有理由违抗，也不能违抗。她懂得这些道理千真万确，只是感情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成家”这个任务。回到营房，她奔进宿舍，倒在被子上呜呜地哭起来。自从离开家，自从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她努力克服任性，克服娇生惯养的小姐脾气，希望得到党和部队领导的信任。政委说得明确，这就是信任。她能拒绝组织的信任吗？她惘然了，不知所

措。

我还是去了五团，由一位干事陪着，因为这是“任务”。但我不记得那天的情景了，不愿意记。他说了些什么？我又说了些什么？整个感觉是麻木的，过去，我不论执行什么任务都快快活活。

1956年回国，由于他的部队去吉林，她也被分到了吉林。不久，部队里有一批干部集体结婚，名单上有他和她。婚礼是隆重的，部队的大礼堂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她却任性跑了。她无法劝阻自己，也不能说服自己。说真的，她宁愿去执行爆破任务，象黄继光、邱少云那样，让自己和敌人的堡垒同归于尽，决不怕步。而她面临的任务实在太难了，要去和一个陌生人共同生活。虽然他是团长、战斗英雄，但这些不能代替感情和感觉（还不敢提爱情）。她的“小姐脾气”又忍无可忍地发作了。婚礼上，一位新娘的突然失踪，比起当年伍小姐的失踪，尽管没有那种父母之心的焦灼，却多了闹剧式的哗然。他，不愧是个镇定若素的军人，不怒不躁，毫不动声色，耐心等待。一个星期之后，她只好回“家”了。他没有一点指责甚至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如果，他暴跳如雷；如果，他拳打脚踢，她大概会慢慢喜欢上他。他却偏偏宽大为怀。不，不是宽大。她恨他无动于衷，恨他比木头还迟钝的反应。在一张桌上吃饭，在一间屋里睡觉，他竟然能忍受他们之间的一连几个星期的沉默，韧韧的心。象根有着极大承受力的牛筋。她可受不了，深更半夜，会象疯了似地嚎叫，又不能惊动左邻右舍，只得捂着嘴嚎，直到精疲力竭丧失掉知觉，才昏昏沉沉躺到天亮……十九岁，怀第一个孩子，她心里没有一点喜悦。为什么要有孩